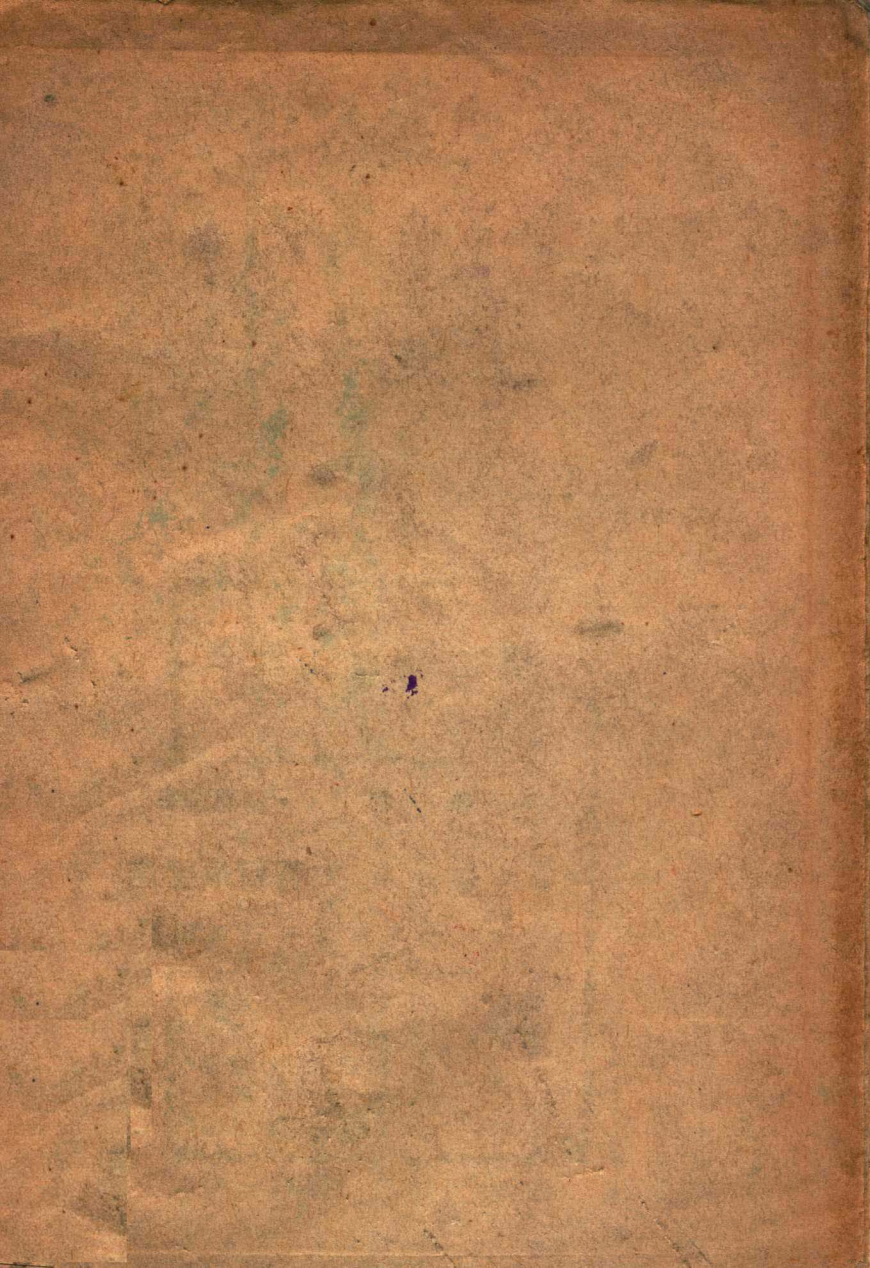




基 斯 龍 符

座 書 華 新 行 太

美



美國政黨內幕

符龍斯基著

太新華書店印行

美國政黨內幕

著者 B·符龍斯基

出版者 太行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版

總店：河南 涉縣
分店：河北 邢台
河南 焦作 安陽
新鄉
山西 長治 左權

目錄

- 一 美國政黨的特點……………(一)
- 二 美國的兩黨制度……………(八)
- 三 爲建立美國第三黨的鬥爭……………(二九)

美國政黨的特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獨佔集團立刻就提出了公開擴張和奪取世界霸權的計劃。這些集團利用保守的民主黨和反動的共和黨所推行的內外政策，對工人階級的民主自由，他們的經濟和政治權利發動了空前大規模的攻勢。美國反動派的這一攻勢的目的不僅是希望把戰時經濟轉變為平時經濟的重擔放到人民大眾的肩上，而且企圖強迫人民大眾為美帝國主義的計劃而工作，以便造成對外政治冒險的『環境』。

由於在戰爭過程中獨佔集團與國家機關的聯繫日漸增強，獨霸國內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成了美國獨佔資本的帝國主義傾向的直接表現者。這兩黨的反動份子在美國的執行和制憲機構中佔據了重要的職位，他們決定着國家的航路，把美國引向新的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新的戰爭的道路。

美國的政黨，以其組織機構和在國內的地位而言，是政治組織史上獨一無二的。查理·勃德，著名的美國歷史家，在『美國政府和政黨』一書中寫道：『政黨的機構一代代地具有更大的包羅萬象的性質，以致最後幾乎成了一個國中之國。』

當政黨的腐敗墮落已過於明顯的時候，在它們的法規中就提出了某些改革。

特別是通過了調整政黨活動的專門法令。這種政府調整政黨活動的方策一直繼續到政黨在許多州內已公開為法律所承認並且已成了政府機構之一部份時為止。

因此，政黨的機構就成了政府機構的一部份。這種變化是適合着那一事實的，就是美國的政黨都沒有足以控制黨機構的固定黨員羣衆。黨和黨員的關係祇發生在最高政府機構的預選中。在民主黨及共和黨內，既沒有黨證，也沒有黨費。如要做這個和那個黨的黨員，根本不需提出任何入黨的申請。

每一個人的黨籍是根據他投票選舉那一黨的候選人而決定的。在選舉前幾個月內，每一位選舉人，如果他要投票的話，就必須登記。選舉人必須在登記時所發給他的選舉票上註明，他擁護那一黨，他準備投那一位候選人的票。同時，他還得聲明，自最後一次決選以來，他不曾參加過任何其他政黨的預選。然後，選舉人將選舉票封在信套裏，投入特設的木箱。選舉後一星期，再拆開信封，根據選舉人的聲明而編製每一黨的黨員表。

除了選舉人在預選登記時親自聲明外，還有其他的確定黨籍的方法。各黨機構時常在擁有選舉權的居民間正式徵收黨員。在南部各州確定誰是黨員的權力常常是授與黨務員的。

然而，這裏基本上保留着「臨時」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每一位選舉人可以在法定程序中，每兩年變換一次自己的黨籍。而這種黨籍的變換，非但黨員，

即使發生在黨的領袖身上，也不會引起任何美國人的驚奇。例如，共和黨領袖之一威爾基，曾經是民主黨的活動份子。前商務部長華萊士及前內政部長伊克斯，從前都是共和黨員。所以，兩黨的黨員數量是一時增加，一時減少的。甚至黨的機構和活動份子的數量也是隨着黨運而變化。當某黨執政的時候，它的活動黨員就增加，反之，如果其他政黨執政了，活動份子的數量就減少。

那末，美國的政黨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在大多數州內，」美國歷史家勃德寫道，「某一黨在上次州選時能够收集到全部選票的一定的百分比，法律就承認它是一個政黨。」

例如，在紐約州，任何一黨祇要在上次選舉中該黨的州長候選人能收集到五千以上的選票，它就可以作爲一個獨立的政黨而參加選舉。如果它沒有得到這許多選票，那末它必須在選舉人之間重新收集必要數量的投票，以便參加下一次選舉。

美國政黨，尤其是民主黨及共和黨的主要工作，就在於爭取總統的席位、州長議員和國會代表席位。

每隔四年，夏天的時候（在十一月選舉前），各黨召集黨大會，提出總統候選人，並擬定政治綱領。這綱領涉及對外政策的問題，彷彿是未來的總統的一篇希望的總賬，而不是他的義務。

選舉揭曉後，總統根本不必遵守他在競選時所提出的政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保障人民立法制委員會舉行辯論時，反動的民主黨員，卡脫·孟納斯柯無恥地說：「讓一位公正的人士讀一讀四十年來兩黨的政綱，我可以保證，他祇會說，如果這些政黨向美國人民所作的諾言都加以實現的話，美國早就毀滅了。」

領導職位的候選人的產生方法，在美國是各地不同的。在某些州裏，候選人的產生方法是早在決選以前，就在各黨黨內舉行預選的。

最普遍的產生候選人的方法是提請求書。每一個要求作候選人的黨員，必須提出有許多黨員簽名的請求書。有時這需要一定的、預先規定的簽名人數，但大多是以本區投票黨員的總數的百分比確定的。

還有這樣的方法：如果某人希望作候選人，他必須付出一筆特別的黨內基金，數額的大小是根據他希望獲得的職位的重要與否而決定的。在某些州裏，例如，在紐約州，候選人是由黨委員會提出的。

在爲了通過選舉綱領和產生候選人而召集黨大會的時期，黨務由全國委員會領導。它舉行重要政治問題的會議，準備召集黨的例會，領導競選運動等。全國委員會由一主席領導，他並不一定是著名的領袖。美國政黨史上有許多範例，證明委員會的主席是傀儡人物，他執行着個別的黨內支配人物的命令。

黨機構中的特別重要的一環是州黨部。州黨部委員會的主席也多是二等角色，由實際領導人物在背後指揮着。州黨部通過自己的代表來領導競選運動，提出候選人、規定選舉人的手續、進行預選和決選。

黨的地方組織形式由特選的機構領導，實際上主要的黨員羣衆是完全被動的，所以政治活動成了集團人物的獨佔品。

查理士·德文特在一九四四年紐約出版的『黨魁』一書中指出，『美國的政治機構製造着領袖、法官、制憲會議和國會的議員而幾乎沒有選舉人的直接監督。在某些城市裏，它讓一個黨魁——『Boss』(Po 在英語中原意爲『主人』。此處是指那些擁有無限的獨裁權力的黨魁。Bo 通常沒有任何正式的職位，然而却掌握着整個黨的機構。)或由他的兩三個黨徒獨裁地控制着各方面的市政生活，並且在選舉州長和議員時具有極大的優勢。』

把選舉人引誘到自己這方面來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Plainville』一書中指出，爲達到這個目的，黨的地方領袖利用了『直接和間接的賄賂、捐款給教會、向婦女獻殷勤、出借農具或者親切地報告商業新聞、緊逼借戶，以宣佈別人的道德上或經濟上之秘密爲要挾的恐嚇，以及散播謠言和謊語等等。』

在許多城市和城區裏，『Boss』們都能够保證自己在黨機構中的獨裁權。

所有的候選人都決定於「Boss」。因此，地方黨集團的領袖，選舉委員會等都完全掌握在「Boss」的手中。甚至州長、檢察官、法官也同樣受着他們的控制，因為這些官員的改選都完全由「Boss」決定的。在這樣的環境中，「Boss」們擁有着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幾十年保牢自己的地位。

另外一方面，「Boss」還有各種「手段」以對付不服從他的人們，其中如：罷免職位、造謠、誹謗、恐嚇、罰款、監禁、暗殺等。「Boss」們總是和盜匪流氓等聯繫着的。盜賊和流氓的賄賂是收入的重要來源，而盜匪們又是選舉運動中的重要支柱。

消滅這個機構，驅逐這些流氓和盜匪是很困難的。要推翻「Boss」，必須他的敵人肯贊助，而這些敵人們也好不了多少。

黨機構化費在準備選舉運動上的鉅大的支出，是不能以下級黨機構的收入來彌補的。所以，黨的全國委員會就資助州委員會，而後者再資助區委員會。在選舉運動時，支出特別鉅大。例如，共和黨在一九四〇年的總統競選運動中支出一千七百萬元。據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統計，在一九四四年，自一月一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委員會共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元（各種捐款不計在內）。在同一時期，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收入為一百〇九萬三千元。

彌補支出的來源主要就是個別人士的鉅額的捐款。在一九四四年向共和黨全

國委員會捐款的人物中，有這樣的大資本家和金融巨頭：大化學托辣斯首腦杜邦、煤油公司老闆比尤、「通用汽車公司」代表毛根等。金融巨頭和「美國鐵礦公司」的經理斯特拉斯是共和黨選舉委員會的領導者之一。Petrol Co. of America 煤油公司的老闆鮑利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會計部長。

美國的兩黨制度

代表美國大資本家利益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表現着所謂傳統的兩黨制度，這是美國政治生活的主要特點之一。這兩個輪流執政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就在於造成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似乎存在着不同和鬥爭的印象，使兩黨瓜分選民的投票而不讓第三黨成立。

列寧在『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和意義』一文中指出了這兩黨的競選鬥爭的特點，他寫道：『自從黑奴解放以後，兩黨的區別已日益模糊了，……這個鬥爭對於人民大眾沒有任何重大意義。人民被這兩個資產階級政黨的象徵而和空虛的『決鬥』所蒙蔽而忽視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又說：『這種統治着美國和英國的所謂『兩黨制度』，是阻止獨立的工人，即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崛起的最巧妙方法之一。』

列寧的指示使我們認識了美國兩大政黨的相互關係。美國的其他政黨都起不了這樣的獨立的作用。小政黨有時雖也獨立地參加競選運動，但它們還從未獲得過決定性的成就。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一位總統是由第三黨的候選人所選出。

民主黨成立約在一百五十年前。民主黨的創立人是美國民主主義的鼻祖湯麥斯·傑菲遜 (Thomas Jefferson)。共和黨成立於一八五四年，距美國內戰開始前

不久。第一個共和黨的總統是林肯，於一八六〇年獲選。內戰結束後，共和黨起而祖護大資本家的利益，由於後者的支持，它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在國內佔着領導地位。

最初，作為北部產業資本家的政黨的共和黨，是與農業的南方的政黨相敵對的。但後來，由於工人運動的崛起和增長以及南方工業化的結果，兩黨間的區別日益減少了，有時幾乎消失了。

克利夫蘭 (Cleveland)，內戰後第一個民主黨的總統，實際上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候選人。為了對抗進步力量和保證自己的候選人在一八八四年的總統選舉中獲選起見，民主黨員與一部份共和黨員在民主黨候選人克利夫蘭的周圍聯合起來，而後者就當選為總統了。

然而，在一八八八年的選舉中，民主黨遭遇了失敗。從此直到一九一二年，民主黨的候選人祇有一次當選總統（一八九二年）。在一九一二年的總統選舉中，由於共和黨內部的分裂，民主黨獲得了勝利，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被選為美國總統。

一九一六年，民主黨在「威爾遜使我們避免戰爭」的口號下又提出了威爾遜為其候選人。小資產階級、農場主人、許多工人、以及德國人和他們的盟友們都囑望於他。共和黨則提出主戰派俞斯為候選人。威爾遜以九千萬票當選總統。

但選舉後不久，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六日，美國就向德國宣戰了。國內民衆對美國參戰的不滿日益增加，這種不滿的情緒在一九一八年的國會選舉中表現得特別顯著，當時共和黨員獲得了國會的大多數席位。

自一九二〇年起，又開始了一段長久的共和黨統治的時期。共和黨候選人哈定 (Harding) 取得了極大的勝利。一九二四年共和黨提出柯立芝 (Coolidge) 爲候選人 (由於哈定的猝死，他自一九二三年八月起已進入白宮)，並且當選了總統。在一九二八年的總統選舉中，共和黨提出胡佛 (Hoover) 爲候選人，他打敗了民主黨的候選人斯米特。但這是共和黨統治的最後四年。

一九二〇年共和黨的執政是以『建立工業的正常條件』和『健全的管理』的計劃爲基礎的。由於當時國內的混亂局勢，美國人很滿意這些口號。共和黨政府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期間，把美國的對外政策轉向了加強美國金融資本的威力，增加對外貿易和國外投資的道路。到一九二六年，美國投資已達一百三十億元 (戰時貸款不計在內)，其中約有百分之三十是在歐洲。

共和黨曾預言，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繁榮』時期可持續『數代之久』。然而，到一九三二年美國人民就遭遇了美國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引起了美國人民的普遍不滿，而這種不滿，部份地表現在一九三二年選舉上，當時共和黨遭受了慘敗，以致在此後的許多年中，都不能取得政權。

自一九三二年起，由於經濟危機和連帶而來的共和黨的政治破產，民主黨的影響重又增強了。在這一年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黨贏得了光輝的勝利；它的候選人——佛蘭克林·羅斯福——獲得二千二百萬票，而胡佛僅得一千五百萬票。羅斯福執政後，宣佈了美國政策的「新方針」，並從事實現這個計劃。

在美國，競選獲勝的政黨通常在國會、州制憲機構和執行機構中都保有着很大的力量。一九四〇年，羅斯福是在民主黨佔有衆議院和參議院的大多數席位的環境下繼任總統的。然而，這個大多數幾乎毫無意義。在二百二十二名民主黨員——國會議員——中約有一百人是南部各州的代表。他們與共和黨員一樣堅決地反對着羅斯福的新政策。

因此，國會中形成了反政府的優勢。這些反對派在國會中給羅斯福總統以一連串的打擊。國會利用它的批准或否決支出預算的特權，肅清了「新政策」時期所建立的許多機構。

同時，共和黨失敗後，漸漸成了一切反動份子和渴望帝國主義擴張、企圖獨霸世界的國內孤立派的活動中心。特別明顯地表現着這種傾向的就是所謂「老衛軍」，它的首領是胡佛和塔虎脫，他們自從戰爭結束，打敗法西斯主義後，已變成了公開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背後站着美國的大資本家。

「老衛軍」的首領們在保守「中立」和「不干涉」的面具下一直推行着與希

特勒妥協的政策。胡佛的整個活動就在於爭取希特勒與西方列強妥協而使他的侵略刀鋒轉向東方。

一九四〇年六月，胡佛在共和黨大會上，提議塔虎脫或杜威為美國總統候選人。據胡佛的意見，他們是能够執行他那與希特勒妥協的政策。然而，由於法國的投降，塔虎脫和杜威的地位大大削弱了。孤立派的杜威曾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輕率地向報界代表宣稱，政府應當向人民保證，「美國決不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任何戰爭，以及交戰國之間的任何談判。」

還有第三位人物——威爾基，他代表着那關心國際貿易和金融的集團。他對法西斯侵略者是採取不妥協態度的。威爾基曾斷言，如果他做了總統，將比羅斯福更堅決地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威脅。

然而，民主黨又獲得了勝利，羅斯福又做了美國的總統。

在選舉運動之後，共和黨內開始分出了「孤立派」和「國際派」，前者以胡佛為首，主張和法西斯主義妥協，後者以威爾基為首，力主國際合作。當時，杜威採取着中間的、中立的態度，這顯然是企圖避免與左右兩翼衝突。由於威爾基的影響日益增強，由於他的周圍團結了黨內的進步力量，「老衛軍」在戰爭的問題上開始表現了某些讓步。

一九四二年四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了威爾基所作的決議，其中說：「我

們不承認任何和平。除非是勝利的和平，我們在未獲勝利前決不提出任何和平的建議……我們自覺到，戰後國家的責任並不局限在美國領土之內，我們的國家還應該協助去爭取世界各國間的相互了解與相互尊重法律和習慣，以免戰爭的陰影重新威脅我們和一切愛好自由和平的民族。」

許多人把這個決議讚譽為共和黨的新方針和孤立政策的結束。共和黨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初，歡迎這一決議時寫道：「這些非常實際的政策宣佈了它與『媾和派』脫離關係，永遠埋葬了孤立主義並且使黨面向了未來。」

然而，威爾基派在共和黨內的勝利為期極短。「老術軍」不但不肯讓出，而且還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在威爾基訪問蘇聯和中國期間，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邀請了三個新的反動派參加其機構，並授予重要的職位。克拉倫斯·凱爾特，帝國主義的孤立派和親法西斯組織「美國為首社」的積極份子，受任為全國委員會的行政指導和宣傳部長；謝謬爾·培坦基爾，「美國為首社」的活動份子和法西斯的「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的首領，被任為財政委員會主席；佛克蘭·哈納脫，反動份子，親法西斯報紙的出版人和「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的創立者，也加入了全國委員會的組織機構。

到一九四二年的國會選舉時，共和黨的力量大大增強了，並達到了很大的威

就。尤其是杜威——紐約州長的候選人，打敗了民主黨的候選人貝恩納特。貝恩納特獲票一千三百萬張，而杜威——約兩千萬張，於是他做了紐約州長。

這是共和黨的『孤立派』戰勝共和黨的『國際派』，特別是胡佛戰勝威爾基的勝利。隨着威爾基的逝世，他的陣營更加削弱了，但是還繼續存在着。當競選運動時，許多著名的共和黨人都表示支持羅斯福連任總統，這決不是偶然的。

共和黨以極大的努力來參加一九四四年的競選運動。自一九四二年起，美國四十八州中，共和黨州長管理着二十五州，他們領導了這些州裏的選舉運動。

共和黨的宣傳家和孤立派的報紙，向選舉人恐嚇說，如果民主黨勝利，國內將確立『獨裁制度』、『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秘密警察』、『官僚主義』等。共和黨議員威萊指責羅斯福政府的錯誤說，它執行着『無原則的對俄英兩國的妥協的政策』。

民主黨人在選舉運動的起初並沒有怎樣努力他們顯然仗恃着羅斯福的聲望。但在選舉的前夜民主黨人大大增強了對抗共和黨的運動。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大會，通過了競選綱領，其中說：『民主黨對和平與戰爭問題的立場是很堅決的。加速勝利的來臨，確立並支持和平，保證一切需要工作的人獲得工作和確保繁榮——這就是它的綱領。』

在競選演說中，羅斯福答允盡一切努力以求迅速獲得勝利和確立持久的、長

期的和平。在同意出任總統候選人的時候，羅斯福指出了美國當前的三項任務：第一、協助迅速地和全面地贏得戰爭；第二、成立國際機構，使新戰爭不可能再發生；第三、建立新的經濟，以保證人民的工作和提高生活水平。

這樣的綱領，對於民主黨右翼代表，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可能減弱他們的勢力，破壞他們對南部各州的政治生活的領導權。南部六州——德哈斯、阿克拉雷馬、阿爾干薩斯、路易西亞納、南卡洛林納和密西西比——的反動民主黨員於是開始反對羅斯福。一九四四年六月初在路易西亞納州召開的會議上，反動的民主黨員決定，如果民主黨競選綱領中不取消關於民族平等和廢除選舉稅的兩項聲明，他們將反對民主黨的候選人。

南部的美國人，奴隸主的後裔們，堅決反對給予一千三百萬黑人以任何權利。爲了使黑人處於無權的地位，應用了幾十種不同的壓迫黑人的方法。在民主黨佔着優勢的南部各州中，黑人是與白人隔絕而居的，他們生活在恐怖和私刑下。

最近，美國國內散播着放肆的「白人優越論」的宣傳，它同時伴隨着虐殺和私刑。報紙上幾乎每天都刊載着虐待黑人的新事件。「黑人民族會議」給聯合國秘書長的信函顯示了這類反黑人行動的嚴重性，這封信是請求聯合國協助美國黑人獲得基本的人類生存權利的，其中寫道：「黑人民族既不能從憲法中獲得對解

放事業的援助，於是就不得不請求國際機構注意這個嚴重問題。

民主黨雖然是一個執政黨，却沒有內部的團結。民主黨內充滿着反動份子和孤立份子，它基本上形成了兩種互相鬥爭的力量——保守的民主黨員，他們是羅斯福政策的死敵；自由派的民主黨員，他們是「新政」的擁護者。作為該黨領袖的羅斯福，許多年來就巧妙地周旋於南部的保守民主黨員和華萊士、伊克斯、霍浦金斯一類的自由主義者之間。

羅斯福斥責反動的反對派的演說，照總統的擁護者的意見，可能引致黨內的分裂，而這種分裂必然為共和黨所利用。羅斯福於是和南部的民主黨員妥協，他拒絕了提出華萊士為候選人的要求。因此華萊士這「具有危險思想」的人物，就做了與民主黨反動派妥協的犧牲品。當時提出了兩個副總統候選人——貝納斯和杜魯門。但貝納斯當時表現着顯明的右傾的態度，羅斯福這才選擇了杜魯門。因此，為民主黨內的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共同接受的杜魯門，就出現於政治舞台上。

一九四四年總統選舉的結果，組成了一個由羅斯福為首的政治聯盟，它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且具有暫時的性質。參加這個聯盟的有：民主黨員——贊助進步改革的「新政」的擁護者；南部各州的民主黨員，他們傳統地支持民主黨，但是反對羅斯福的對內政策；北部各州民主黨的「Boss」(即黨魁)，他們企圖建立私自的政治機構；擁護美蘇密切合作的美國工人黨和極端否定對蘇關係的

美國自由黨；產業職工大會；保守的商界代表和贊助羅斯福對外政策的進步的共和黨員，以及共產黨。

共和黨人用以對抗羅斯福的清楚而明確的綱領的是一些含糊的、曖昧的公式，企圖以此來「誘取選票」。在共和黨的綱領中說：「我們將以國際合作的方法來達到上述目標，但決不加入世界之國。我們擁護美國參加戰後獨立國家的合作機構，其目的是防止軍事侵略，確立持久和平及正義；然而，我們認為和平與安全並非單單決定於運用力量，而應該以承認各國的相互利益的國際條約確立起來。」

在評論共和黨綱領的這一部份時，一九四四年六月號的「民族」雜誌寫道：「共和黨選舉綱領的對外政策部份的解釋者（其中包括杜威本人）所最關心的就是怎樣向我們解釋這綱領所沒有表示的意思。這個綱領並沒有規定美國要加入世界之國。它並沒有責成我們去參加建立國際軍警力量。它並沒有剝奪我們的宣戰的權利。這一切都很好，但這不是說，共和黨政府就將完全贊助國際集體安全機構，如果這也需要在國家的主權方面作某些犧牲的話？這就是每一個人感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威脅的人們所要求回答的問題。」

共和黨人企圖把競選運動的重心從對外政策的問題轉移到內部政策的問題上，轉移到與羅斯福的「新政」的鬥爭上去。共和黨嚴厲抨擊羅斯福的解決民衆

失業問題的方法，稱它爲『政府與私人企業的競爭。』

在他們的綱領中指出，『我們反對以支出國帑和造成預算中的赤字的方法來恢復繁榮的理論。』他們要求回復到老的、胡佛的『仁慈』的時代，當時國家對經濟是不加干涉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底和八月初在聖路易城舉行的二十六位共和黨州長會議，是共和黨的積極競選鬥爭的序幕。共和黨的領袖們，顯然企圖利用這些州長屬下的行政機構，以達到增加共和黨選票的目的。

在杜威主持下召開的這個會議，提出了一個問題綱領，共和黨人希望在這些問題周圍能收集必要數額的選票。這個綱領對羅斯福政府及其『新政』作了嚴厲的抨擊。州長們斷言，羅斯福的新政策將招致國家的危機。

然而，共和黨州長們對外交政策的緘默（這顯然是因爲它符合着共和黨的總路線），使許多團體，包括共和黨人在內，不得不拒絕支持共和黨的候選人。這些團體雖反對羅斯福的許多對內政策，但他們也害怕，一旦杜威獲選，共和黨的強烈的孤立傾向將影響他的政策。因此，他們寧願選舉羅斯福，認爲他的獲選是促進國際合作及保障世界和平的最好方法。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太平洋沿岸的共和黨集團，以著名法律家克拉姆爲首，宣佈成立了『共和黨人擁護羅斯福委員會』。在委員會的宣言中，對於杜威

是否能夠和願意執行進步的對外政策表示了懷疑，它指出，戰前「杜威的反蘇演說，使我們沒有理由希望他能在和平會議中友誼地和積極地與蘇聯合作。」

一九四四年選舉結果，共和黨遭受了新的嚴重的失敗，反動的「老衛軍」接連四次把共和黨人引向了失敗。支持杜威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寫道：「共和黨人要取得政權，必須有一個進步的領導機構。它需要一種進步的對內政策，但主要是對外方面的進步政策。」

該報指出，選舉結果顯示美國人民是願以一切方法來達到持久和平的。該報希望「甚至共和黨內最保守的政治家也接受這個教訓」。

然而，這希望並沒有實現。羅斯福的去世更激勵了兩黨的反動份子。在繼任美國總統時，杜魯門發表聲明稱，他願意在各方面繼續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杜魯門總統的這個願望似乎由那件事實證明了，即他同時請求政府官員各留原位，不作變動。但是一個月後，杜魯門就宣佈司法部長比特爾、勞工部長潘金斯、農林部長維卡德等人的辭職，而任命司法部副部長、保守份子克拉克為司法部長；前參議員、自由主義者斯華倫巴赫為勞工部長；以及在國會中採取反動立場的眾議員安德遜為農林部長。六月三十日白宮宣佈，南部保守派貝納斯代替國務卿斯退下紐斯之職。此後不久，在七月六日那天，財政部長毛根韜又被迫宣告辭職，起初由文遜氏，後由銀行家施爾德繼任。最後，陸軍部長史汀遜和內長伊克斯

也相繼拋去了職位，而由陸軍部副部長柏德遜及軍事生產管理局長克魯格代之。這樣一來，羅斯福政府的十位部長中祇剩下了兩人：海軍部長福萊斯脫和商務部長華萊士。

就杜魯門政府中大多數換了保守份子這一事實，杜魯門是完全拋棄了他以前的支持羅斯福政策的諾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位自由主義者——毛根翰和伊克斯——的退出政府。雖然毛根翰希望能完成資助作戰和消滅德國工業力量的工作，但杜魯門在談話中明顯地向他表示，他已到了辭職的時候。

最令人憤慨的是伊克斯——民主黨的「新政」領袖之一——的退出政府。先是杜魯門任命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會計部長和 Penon 油公司經理保萊為海軍部副部長。當參院討論此項任命時，發現保萊曾用「不正當的手段」將加利福尼亞的油源，轉入他的控制之下。在參院委員會中伊克斯宣佈，保萊企圖引誘他向政府勸說，使政府放棄加利福尼亞的油源，而答允事成後，為民主黨捐募鉅額基金。然而杜魯門堅持保萊的委任令，並且，據伊克斯說，還企圖勸他「幫同掩飾」。他不滿意總統的行爲，於是宣告了辭職。

隨着杜魯門的執政，民主黨內的保守和反動的勢力劇烈增長了。控制着國會各委員會和佔據着重要職位的南部黨員，在管理國家的工作中起了領導的作用，因此也獲得了阻礙進步的社會經濟改革的更大的可能性。他們使確保人民職業和

增加工人工資的法案不能通過，他們使保障正當僱用勞力的委員會不能成立，他們又阻礙了保健計劃的批准。

許多美國人正確地指出，杜魯門的內外政策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廣播評論家史蒂爾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廣播中宣稱，目前的危機是羅斯福逝世後所產生的那一傾向的最高峯。卡特爾和獨佔組織的首腦們開始向羅斯福的「三強」（指蘇、英、美）團結和對蘇合作的思想作鬥爭了，杜魯門以貝納斯和范登堡的殖民政策代替了羅斯福的民主政策。

由於杜魯門政府的內外政策的改變，「老衛軍」大大地活躍起來。羅斯福逝世和赫爾辭職後外交政策方面所形成的缺口，已由帝國主義的代表們——共和黨員胡佛和范登堡之流填補上了，他們企圖在自私的反動的基礎上改造美國的對外政策。「紐約郵報」的觀察家格拉富頓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寫道：「自從羅斯福死後，反對派（指共和黨方面——作者）無比地增強了並且破壞了力量的均衡。我們現在所研究的不是與盟國合作的問題，而是怎樣與它們不和的問題。」

最近，「老衛軍」開始積極參加了對外政策的各方面工作。他們的代表在國會和政府中佔據着高位，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演說等等。胡佛就不斷向發表反動的和反蘇的演說。

雖然，胡佛表現着顯著的親法西斯的觀念，但據白宮的秘書羅斯說，杜魯門

却在他身上「發現了建設性的思想」。胡佛的這種思想顯然為杜魯門所喜愛，因此他派遣胡佛到歐洲去「考察當地的糧食情況」。胡佛的使命引起了進步世界輿論的自然的不安，因為胡佛過去的全部活動都是為了保存歐洲的法西斯和反動政權的。所以，胡佛此行的唯一目的是企圖用分配糧食的方法來鞏固法西斯政府的政權，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鼓勵反民主政府把糧食作為政治武器一樣。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回返華盛頓後，胡佛與杜魯門作了長時間的會談，這次談話，據羅斯說：「結果甚為滿意」。羅斯並向記者宣稱：「胡佛同意往拉丁美洲各國一行，以便獲得這些國家對抗亂運動的援助。」同時，在白宮的記者招待會上。胡佛發表了挑撥性的謊話，他說，蘇聯可以拿出一部份糧食，「因為它在滿洲奪獲了巨額的糧食。」

追隨胡佛之後的還有其他共和黨的領袖們。例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反動份子和挑撥專家李斯，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在渥海育州發表演說稱，蘇聯是一個「被管制的社會，它事實上在各方面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所反抗的全體主義相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至十日在芝加哥召開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會上，伊里諾斯州長葛林演說稱：「美國的外交不再是民族自由和小歐生存的堡壘，而成了英國、法國和共產帝國主義的僕人……權力政治已統治了世界，而杜魯門政

府却袖手站在一旁。我們要警告，妥協在今天，可能像慕尼黑時代一樣的危險，尤其當它意味着與美國的良心妥協時。

非常明顯的，共和黨州長的這段話是對國際合作，特別是對美蘇合作的攻擊。這次大會通過了共和黨國會代表在塔虎脫和馬丁指導下所擬定的綱領。在這綱領的對外政策部份中指出，該黨將支持聯合國機構，將與主要的盟國一同推行共同的政策。然而，「大國控制及壓迫小國」的要求是與此相矛盾的。「我們」，綱領中說，「反對大國的控制，反對所謂爲了國際和平我們必須贊成與我們相異的意見或不再爲弱小民族而爭取正義的理論。」

說到對內政策時，芝加哥大會的綱領指出，美國人正面臨着「過激主義、官僚主義」和「依據公正法律的美國自由人士」之間的競選鬥爭。該綱領批評了政府的「引起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的政策，顯然，這是指政府的某些改革法案。關於這點，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參議員塔虎脫的廣播中說得更其明顯，這篇演說，據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聲明，是反映了「共和黨人的觀點」。塔虎脫當時說，保障人民職業的法案是「直接從蘇聯憲法、共產黨綱和產業職工會抄襲來的」。

而保健計劃則被他指爲「醫學界的社會主義化」和「左翼共產黨的建議。」從此，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外交活動就具有了極端的侵略的性質。美國外交人員在國際舞台上所發表的言論證明，民主黨政府已放棄與其他強國平等合作的政

策，而跟着反動的共和黨員走上了奪取世界霸權的道路。

爲了確保自己的獨霸世界的地位，美國企圖抹煞和拋棄克里米亞及波茨坦決議的文字與精神，從而摧毀戰時所建立的英美蘇的合作。美國的外交方針從鞏固強國的合作而轉上了對蘇發動「和平攻勢」（美國務卿貝納斯語）。這種「和平攻勢」是在英美同盟以及在擴充武力、海軍示威和原子彈的試驗等伴奏之下進行的。

代替歷屆國際會議所決定的戰後時期大國密切合作的原則，而却提出了劃分戰後世界爲敵對的「勢力範圍」，和建立各種「聯盟」及「同盟」的觀念。英美好戰份子所提出的英美軍事同盟就是盎格羅撒克遜集團獨霸世界計劃之一。

一九四五年九月各報公佈了一件「新的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的秘密備忘錄，作者是目前對外政策協會主席、反動的共和黨員和民主黨員的首領貝埃爾。這個備忘錄是分送給國會議員和政府要員的，其中提出了許多直接對付蘇聯的外交和軍事方策，包括建立英美同盟在內，它建議「採取強硬的壓制「蘇俄帝國主義」的政策，同時永遠和英國及其他追隨英美同盟之後的國家共同行動。」

所以邱吉爾選擇美國作爲他發表英美同盟反蘇的演說地點，是不足爲奇的。邱吉爾是把盟國不和的種子撒在施過了肥料的土地上。而如果這篇演說在美國人民中並沒有發生像邱吉爾所預期的那樣的反響，那末這不過是因爲美國人在富爾

頓演說中正確地看出了想藉美國之助來保存和恢復英帝國主義的企圖。

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在對外及對內政策問題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當一部份黨員贊成推行對蘇的『殘酷政策』時，『新政』的擁護者則堅持着羅斯福的美蘇合作的觀念。

鑒於右翼份子對民主黨政策的決定作用以及『新政』擁護者的委屈的地位，作為民主黨支柱的勞工運動的進步代表們對杜魯門政府就表示了日益增漲的不滿。勞工運動代表們的此種態度，當然，引起了某些思想進步的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不安，因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會改選和一九四八年的總統競選都是決定於工人的選票的。杜魯門政府的內外政策的危險傾向，受到了以裴伯、伊克斯、毛根韜、華萊士等人為首的強大的反對派的反對，他們嚴厲抨擊外交方針和對內政策的反勞工的傾向，並且要求美國爭取真正的三強的團結。

這種內部的裂痕是如此明顯和危險，以致杜魯門不得不設法與『新政』擁護者妥協。因此，許多總統的顧問都認為，目前為了保存民主黨內的團結，必須有一個適合『新政』的大胆的綱領。

反動民主黨員和共和黨員的獨霸世界的企圖，在共和黨的溫和派中間也留下了惡劣的印象。一九四六年七月初，由國家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主辦的『我們的對外政策』廣播節目中，共和黨參議員愛肯發表演說，嚴

厲抨擊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他指出，這種政策是向着實現英美獨霸世界的道路走的。愛肯說：『如果美國過分密切地與英國聯合，其餘的國家將懷疑我們企圖樹立英美的世界霸權。然而，美國人民新希望的並不是世界霸權，而是世界合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以史塔森爲首召集的『共和黨公開質詢會議』所提出的質問，也顯示了共和黨員中間的反對情緒。在六五二位提出各種對蘇問題的共和黨員中，有百分之五十八贊成『以公開與俄國討論今後政策的方法來重新達到美蘇的完全協議』的政策。祇有百分之三十贊成『加強英美聯系以便共同抵抗俄國共產主義的擴張』的政策。

在許論質詢的結果時，著名廣播評論家蘇英格說：『如果這些結果反映了共和黨內的一般意見，那末就是說，百分之三十或更少的共和黨員贊成目前貝納斯所推行的政策。如果這種政策祇是對於四十歲以上的、有鉅額收入的共和黨員是正確的，那末這種百分比在較年青的共和黨員中、在全體民主黨員中，以及在收入較少的人民中將還要少。普通的美國人，在健全思想的基礎上，漸漸開始對解決外交的困難表現了比他們的領袖更大的理智、勇氣和決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美國人民是不願意把世界分爲兩個不同的準備戰爭的體系的，像目前所進行的那樣。』

然而官方的對外政策佔了上風。如果羅斯福是推行『稍左』的政策，那末杜

魯門，不管他曾經允諾繼續羅斯福的方針，却是推行着「極右」的政策。保守的民主黨員和反動的共和黨員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聯合起來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范登堡在參院發表演說，他號召對蘇聯採取「殘酷政策」。幾天後，貝納斯也發表了與范登堡的意見非常近似的演說。因此，保守的「太陽報」滿意地指出道：「美國兩大政黨在決心尋覓正確的立場中團結起來了。貝納斯與范登堡的觀點的一致就是這種團結的明證。」

民主黨員貝納斯所推行的美國對外政策獲得了兩黨的支持。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范登堡在巴黎參加外長會議的工作時所作的談話證明了這點。他聲明道，兩黨代表之間沒有任何分歧的意見。不論民主黨代表康奈利或是范登堡，都完全支持美國務卿貝納斯在外長會議談判過程中所根據的方針。

貝納斯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發表外長會議的巴黎協議時，宣稱：

「在執行此項使命時，我得到參院外交問題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康奈利和該委員會委員、共和黨議員范登堡的協助。我無法形容，我是如何地尊重他們的賢明的意見和忠誠的合作……參議員范登堡以他的真心合作向全世界顯示出，不管他和他的黨在國內問題上不能同意政府，但在對外方面，我們却祇有一個政策——美國的政策。」

所有這一切，都是適合那存在於整個美國歷史上的、為保護資本主義體系的

兩黨專政制度的。有不少例子可以證明，當大資本家的專政遭受威脅時，這兩黨就立刻聯合一致了。

爲建立美國第三黨的鬥爭

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形式上雖是兩個敵對的政黨，但當美國大資本家的專政統治受到威脅時，它們立刻就會攜手起來。足以造成這種威脅的是處在民主黨與共和黨『勢力範圍』之外的所謂獨立的選民。獨立選民的存在一向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美國選民中，約有三分之一是民主黨的擁護者，另外三分之一是共和黨的擁護者，其餘三分之一則是獨立的選民，他們有時擁護民主黨，有時擁護共和黨，視國內政治環境而定。

『提起黨派政府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意義，』美國歷史學家查理·勃德寫道：『同時就不能否認無黨無派組織的影響。無黨無派和獨立人士的投票常常是決定性的，尤其在兩大政黨勢均力敵之際。』

美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事實，即獨立選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組織，以對抗主要的政黨。在上世紀，美國各州開始成立了工人的、農場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政黨。農場主受着銀行資本（以高利貸款）和鐵路公司（訂立極高的運費率）的壓迫，因此他們在一八六七年組織了『振興農業社』，提出了建立農業合作社的任務，以抵抗銀行資本和鐵路公司的壓迫。

稍後，在一八七五年，出現了 Green Back Farmer Party，其名稱係取自一種背面為綠色的紙幣，該黨主要反對當時執政的共和黨，指責它故意減低紙幣價值，企圖停止紙幣的流通。一八七六年該黨參加總統競選，但並未獲得什麼成就。在一八八四年的總統競選後，Green Back Farmer Party 宣告瓦解了。

美國農場經營者的困苦情形引起了非常廣泛的農民運動，它在美國歷史上被稱為「人民派運動」。一八九〇年成立了美國人民黨，它要求民主改革，把土地交給「真正的農民」，制定所得稅等。人民黨聯合了小農場主、小商人和小企業家，並獲得大多數職工聯合會（包括美國勞動聯盟）的支持。依靠羣衆的支持，人民黨作爲一個獨立的政黨，參加了一八九二年的總統競選，獲得了一百餘萬票。

然而，在下一大選舉中（一八九六年），人民黨採納了民主黨的建議，與它結成了統一戰綫，以便打敗共和黨的候選人。它們提出卓越的演說家和著名律師奧勃蘭爲總統候選人。奧勃蘭在競選演說中猛烈抨擊金融集團、托辣斯。他獲得六百萬票，但仍舊遭遇了失敗。共和黨候選人麥金利當選爲美國總統。人民黨失去了自己的組織後，不久就夭折了。

同時，工人階級也作爲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走上社會生活的舞台。一八七二年成立了「工人改革黨」，它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和限制投機商人購買空地等要

求。一八八八年該黨更名為「聯合工人黨」。

一八七七年在美國出現了社會主義工人黨。它是在獨佔資本主義的時期展開活動的，當時美國資產階級用了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的方法，得以順利推行其分裂工人運動的政策。

該黨開始在多民族的美國工人階級間傳播工人國際主義和團結的觀念。然而，由於成份的複雜，宗派份子和改良主義者的混入隊伍，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沒有成爲一個羣衆的政黨。

差不多有十五年之久，社會主義工人黨隔絕了政治鬥爭，而把自己的主要活動局限在經濟性的問題上。由於宗派主義、脫離工人階級和對政治問題的猶豫不決，結果該黨領導機構不願意也不會利用國內的有利條件去建立真正的羣衆關係和執行它在工人運動中的巨大的歷史使命。

一八九七年，在葉夫蓋尼·台勃斯的領導下成立了社會民主黨。美國政治生活的普遍高漲，促進了該黨影響的擴大。結果，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員於一九〇一年都轉入了社會民主黨。不久，該黨就稱爲社會黨。它開始用和平的、議會的方法來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社會黨的領導機構採取了可恥的溫和的立場。它不但動員羣衆去反對戰爭，而且還千方百計地企圖把羣衆的目光從反戰問題上轉

移開去。但是，當美國的必然參戰已經非常明顯時，該黨的正統首領們向威爾遜總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在致總統的呼籲中，他們請求他不要宣戰。然而，美國終於參加了戰爭，於是該黨領袖們又聲明「願忠誠支持美國政府及其盟國」。

但在社會黨內存在着另外一種力量，他們並不同意正統領導機構的態度。一九一五年，在波斯頓的社會黨內成立了社會主義宣傳聯盟，它立刻就接受了基米華德（基米華德為瑞士大城，第一次世界大戰初，世界社會主義者曾在該地舉行反戰大會。）左派的綱領。列寧認為這個聯盟是美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先鋒的胚胎，在給A·柯倫泰（A·柯倫泰現為蘇聯駐瑞典大使。）的信中他寫道：「這是一個國際主義的、具有顯然左傾的綱領的聯盟。」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聯盟建立了一個布爾塞維克情報委員會，它印發了許多傳單和小冊子，以宣傳年青的蘇俄的政策和揭露美國報紙的反蘇誹謗。

社會主義宣傳聯盟在動員羣衆反對干涉蘇俄（尤其是反對美國干涉）的鬥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聯盟和左翼社會黨的口號「退出俄羅斯！」在羣衆中獲得了廣泛的同情。美國各處舉行了羣衆的示威和集會，一致決議反對干涉。當時還有數百人報名，願赴俄國去參加紅軍隊伍。

戰爭結束後，社會主義宣傳聯盟組成了社會黨內的左翼。到一九一九年初，這一翼已有它自己的黨員證並獨自收集黨費。盧登堡，著名的美國革命領袖，建

立了社會黨左派黨員會議，發表了「社會黨左翼宣言及綱領」。

左翼宣傳在社會黨內植下了深固的基礎。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全國各地舉行黨委員會的選舉，在十五名執行委員的候選人中有十二名是左翼候選人。這種情形使黨的右翼領導人物不得不採取堅決的行動。他們宣佈選舉結果無效，並指定於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舉行黨的非常會議。爲了保證他們在這次會議中的優勢，執行委員會開除了約六萬名黨員。

一九一九年六月，社會黨左翼在紐約召集會議，以討論該黨領導機構的分裂活動。然而，在對右派鬥爭的策略問題上發生了紛歧的意見，結果形成了兩個共產黨：以盧登堡爲首的美國共產黨，它的支柱是移民革命聯盟，和李德爲首的共產主義工人黨，它的主要成份是美國人。這兩黨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合併爲統二的美國共產黨。

隨着共產黨的成立，社會黨的影響迅速下降了。在分裂前，該黨黨員約有十六萬五千人，一九二〇年減至二萬七千人，到一九二二年祇剩一萬一千人了。

自該黨領袖和理論家海德奎特死後，諾門，湯麥斯繼任該黨首領，他是一個沒有一定見解的人物，不久就投入了反動陣營。一九四四年在雷丁城召開的社會黨大會變成了與納粹黨徒妥協的會議。

在羅斯福就任總統的時期，產生了一連串的獨立運動。直到一九三六年，當

美國金融資本的反動集團劇烈反對羅斯福時，這一運動才與民主黨的「新政」擁護者聯合起來，拋棄了獨立的性質。例如，明納索州的「農業工人黨」在一九四四年的總統選舉前，與該州的民主黨攜手起來。

爲再度選舉羅斯福任美國總統起見，一九三六年四月成立了美國工人黨。然而，不久它就變成一個紐約州的工人和智識份子的政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所通過的綱領中指出道，「在目前所發生的政治力量的變動中，一個強大的工人政黨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

紐約州的美國工人黨事實上比民主黨本身更熱烈地支持着羅斯福。它始終給羅斯福以四十萬——五十萬張選舉票。

目前，在美國的進步團體中重新開始廣泛討論關於建立第三黨的問題了。美國工人羣衆對杜魯門政策的日益不滿，刺激了組織新的羣衆黨的要求。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獲得一致。現在至少有三派各自提出對這問題的意見。一派建議，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進步份子的聯合作爲建立第三黨的基礎。另外一派認爲，聯合作國內進步份子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應該是新黨的核心。最後，由社會民主黨和托派組成的第三派，則建議把美國社會黨作爲第三黨的基礎。民主黨和共和黨內的不滿現存領導機構的進步份子，認爲兩黨的反對派可以聯合成一個獨立團體，作爲建立第三黨的基礎。紐約市政府長官、進步共和黨員

摩立斯，建議在共和黨內建立一個與該黨反動領導機構積極鬥爭的集團，他預測，將來進步的共和黨員和其他進步團體可能聯合起來。

把政治行動委員會作為新政黨的基礎，是職工組織的進步領袖方面的建議。喬奇·亞德斯，汽車工業職工聯合會的會計部長，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宣稱：「我們應該使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真正的第三黨運動的細胞，這個運動是動員一切政黨內的自由份子的開端。」

許多人認為，由於這個建議出自職工會的左翼，它的成功是很可疑的，因為職工會的右翼寧願支持民主黨，而不願在左翼份子的領導下建立第三黨。例如，「午報」指出，職工會的左翼份子不能強迫職工會的領袖們採取什麼行動，因為梅萊伊及其擁護者是反對建立第三黨的。該報雖承認有建立新黨的必要，但認為尚需稍待時日。

民主黨的領導機構害怕失去進步職工會的支持，因而恐嚇道，第三黨的建立祇會幫助反動的共和黨獲得勝利。民主黨出版部長奧赫爾向報界宣稱，如果工人建立了第三黨，這祇會使勞工的敵人們更容易取得勝利。

亨利·華萊士也反對在目前組織第三黨。在民主黨的機關雜誌「民主」上，他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指出，第三黨將分散進步團體的投票，因而祇會保證反動派的勝利。華萊士認為，祇有當大多數選民都堅信，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沒有什

麼差別時，第三黨的建立才有了基礎。

前內政部長，現任「科學及藝術工作者獨立市民委員會」主席的伊克斯，也抱着相同的態度。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他在紐約演說稱，建立第三黨的必要是可能產生的，但是這還須要時間。

把社會黨作為建立第三黨的基礎的建議，是伴隨着社會黨大會的一項特別聲明，其中說，新的第三黨不應該讓「法西斯共產主義」團體混入。所以，托派和偽社會主義者一開始就企圖污蔑真正羣衆的進步政黨的建立。

建立第三黨的傾向在美國已日益顯著了。大部份美國人民對反動派的攻勢已加以堅決的抵抗，他們希望結束兩黨專政的制度。美國人需要一個第三黨，以便更順利地為爭取國內民主權利和確立國際合作而鬥爭。